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
评传丛书

何其芳评传

贺仲明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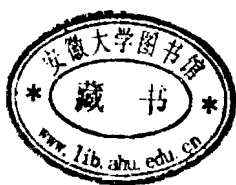
总主编 张一兵
执行主编 丁帆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
评传丛书

何其芳评传

贺仲明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总主编 张一兵
执行主编 丁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其芳评传 / 贺仲明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

ISBN 978-7-305-09109-4

I. ①何… II. ①贺… III. ①何其芳(1912~1977) —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0068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何其芳评传
著 者 贺仲明
责任编辑 胡 豪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4 字数 300 千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9109-4
定 价 59.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再复 袁伟时 葛剑雄 董 健

总 主 编 张一兵

执行主编 丁 帆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帆 王一川 王中忱 王彬彬

叶兆言 田本相 朱晓进 孙 郁

吴义勤 吴为山 张一兵 张 法

陈思和 郑也夫 胡 明 徐兴无

蒋述卓 曾华鹏 温儒敏 赖永海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教育部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酝酿多年的一个课题计划，它的主旨就是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化在极其复杂的语境下是怎样孵化出一大批文人名流的窗口，从而回到历史的现场，更真切地从历史的脉络和缝隙中识别那个时代的文化真实，体悟那个时代里名人的心路历程。

近三十年来，海内外陆续出版了许多文化名人的传记和评论著作，可谓十分繁多，其中亦不乏可圈可点之佳作。但总起来说，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要么就是注重文本的传记特征，凸显其文学性，而淡化了史料性和学术性；要么就是从纯学术性入手，只注重对传主遗留文字内涵的学术性发掘与剖析，而忽略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揣摩，对其工作与生活事件的叙述以及对文本艺术性和文学性的追求。从技术层面上来看，这似乎只是个体例问题，其实它关乎的却是文化理念以及方法运用等宏观统摄的大问题。

我们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关于怎样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完成评与传的问题，尤其是传的部分，如何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应该是每一个学者应该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

当“历史是一个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成为许多历史学家回避历史真实性的遮羞布时，当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史学界治史的箴言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历史一次次被歪曲的悲剧。我们是一个不缺乏历史教育的国度，但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往往是建立在充满着过度丰富的“历史的想象力”之中的，实用政治对历史学的干预往往建立在夸张、扭曲、变形和虚构的基础之上，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对历史的误读——远离历史的真实成为一种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历史是永远不可能“还原”和“复原”的，但是，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最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然而，这个底线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次又一次被突破呢？实用历史的观念把历史学推向了深渊。曾几何时，对秦始皇的过分褒扬而掩盖其非人性的残酷一面，无非是为彼时的专制制度树碑；对各朝各代法家的歌颂无非是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立传；对成吉思汗穷兵黩武的膜拜无非是为人类“兽性”张目，因而，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文学抒情，却成为史学界的治学指南时，注定会产生历史学教育的悲剧结局。同样，对辛亥革命的由贬到褒的过度阐释，片面地追求“历史的想象力”，也正是体现了史学界实用主义的治学理念，倘若这种理念不改变，我们的历史学教育仍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滑行。即便是并不遥远的现代史，涂抹历史的记忆也同样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我们以为，“历史的想象力”应该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公开的基础之上，它应该是照亮历史幽暗处的一束光线，使其成为更加光明的原动力；它更应该是填补历史细节不足的润滑剂，成为使其更加丰满起来的驱动力。它不能建立在凭空想象的基础上，没有坚实的史料作为基础，没有基本史实作为实证的依据，就不能抵达历史真实性的彼岸，只有在实证加合乎逻辑的想象前提下，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原态。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谈“历史的想象力”，可能会有许多古往今来的事例可举，只一部《红楼梦》就足以证明它在文学艺术中的生命力所在。但是我想举证的恰恰是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滥用“历史的想象力”的弊端。

自台港文学中的武侠历史小说流入大陆以后，效仿戏说历史的风潮开始蔓延，作为一种消遣休闲文学，这似乎是无可指责的创作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事实：许多喝着这样的文学奶汁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居然将那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故事当作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来阅读，尤其是在这个人文意识日趋淡薄、工具理性日益发达的时代，那些只希望在“快餐”中获得和完成人文教育的人，是无视历史学和消遣文学之间的界限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文学教育和历史教育的悲哀。

如今的历史题材创作已经到了不戏说和不杜撰历史就不能成书的地步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们对于那种需要查阅大量史料，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有凭有据地发挥“历史的想象力”的功夫已经失去了耐心，那种“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磨一剑”、“一辈子磨一剑”的严肃创作态度已然被消费文化时代的“快餐”制作法所取代，谁还愿意穷几十年的皓首来“磨铁杵”呢？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题材的严谨创作已不复存在，为弄清楚一个历史细节花费巨大精力的创作将会成为历史。不知道这是文学的幸还是不幸呢？！

从没有“历史的想象力”到过度的“历史的想象力”，我们的历史和文学走过的道路并不曲折，但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结局。我们需要的是贴近历史原态的价值理念，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成为一个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的典范。

本着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原则，我们在准备编纂这套丛书时，就明确要求作者将“传”与“评”尽可能完美地结合。所谓“传”，是作者以叙

事的方法再现传主的生活历程；所谓“评”，是作者直接站出来阐释、论说传主的人生意义与文化成就。做到在真实可靠的史料考察基础之上，既具备叙事的文学魅力，又不失清晰的学术剖析。我们充分注意到了本套丛书的受众面——既要为少数文化研究者提供可资参考的史料和学术视野，同时也要兼顾广大文化和文学爱好者拜视文化名人的嗜好，为文化普及做好基础工作。因为我们深知，无论是专业研究，还是业余爱好，一旦失去了其趣味性，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一个“自由王国”境界的。所以，我们倡导在严谨的叙述中，避开那种繁琐考证和过多纠缠于枝节问题的写法，力图着眼于大事件和传主之间的勾连，以及传主行状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关联性，以此来勾勒与构筑传主在历史现场的真实存在。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消费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守成主义者，固守拒绝任何想象的传统“评传”写法，摈弃一切文学的想象和合理的推论。但是，我们绝不提倡那种以出卖传主隐私而获得名利的商业性炒作，反对那种“演义化”的写法。因此，本丛书的编撰原则就十分清楚了，广大读者也可从中看出某种端倪。

为了丰富本丛书史料的直观性，我们要求作者尽可能提供一些有关传主的图像资料，内容包括生活照、手稿、书影等等。其目的就是在严肃的学术性观照中增加历史现场感，同时给书籍的装帧增添一些活泼的色彩，融学术性与艺术性为一体。

丛书将会以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多属新制原创，少量是旧著修订新版，我们也将在此过程中不断改进和不断完善，将这一套丛书做成一流品位的文化书籍。我们相信，有众多高水平作者的支持，有广大高品位读者的呵护，有一个高要求的编委会以及出版单位的努力与支持，这套丛书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

丛书编委会

2012年1月

目 录

001 / 绪论	我是谁? ——何其芳的悲剧意义
010 / 第一章	乡村童年
044 / 第二章	少年求学
080 / 第三章	爱与诗的幻想
130 / 第四章	“摇醒成都”的日子
158 / 第五章	“我歌唱延安”
212 / 第六章	“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
243 / 第七章	批评者的《回答》
303 / 第八章	“文革”十年
336 / 第九章	最后的岁月
358 / 附录:	何其芳年谱简编
368 /	主要参考文献
370 /	后记

| 绪论 我是谁？——何其芳的悲剧意义 |

毛泽东曾经笑着对何其芳说：“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对于何其芳来说，这几乎是他一生的谶语。他给自己，给世人留下的，就是一串无尽的问号。可以说，“我是谁？”的疑问，是对何其芳一生最准确的概括和追问。

对于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来说，20 世纪是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艰难的时代。漫长的封建制度在这一世纪之初终于结束，中国社会跨出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步伐，中国文学也因之具有了全方位转型的基本前提。事实上，在随后进行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大“换血”过程中，文学承担了重要的先锋使命，由鲁迅等精英构成的现代文学第一代和第二代作家，既以顽强的精神参与着社会文化变革，也艰难地蜕变着自我，追赶着现代文明的潮流。他们在思想和精神领域的贡献，甚至比在文学领域的贡献还要突出。

然而，长期封建体制所衍生的文化积习和 20 世纪社会变革的坎坷，注定了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必然承载过于沉重的精神负担，它的发展道路必然是坎坷而曲折的。在鲁迅等作家于“绝望中反抗”和荆棘中前行

时,也有不少作家屈服于各种政治权力的阴影之下,表现出了中国文人软弱和奴性的一面。周作人、姚文元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世纪变革期的艰难和沉重,赋予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悲壮,更给以文学为终生事业的现代中国作家的命运涂抹上了强烈的悲剧色彩。

这一悲剧最典型的表现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优秀文学家都不能保持持久而坚韧的创作生命力,甚至很少有作家能够持续一生在文学事业上跋涉。最为常见的现象是,一个作家的处女作往往就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一生的最高成就,此后,他或者反复地重复自己,或者以不同方式终结了自己的创作生命。20世纪的中国文学没能取得更高的成就,没有出现真正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与这一现象有着根本的关联。

这其中有一部分作家是在20世纪强大的社会外力压迫下放弃自己的创作的。如在漫长的抗日战争中,就有丘东平、萧红这样充满才华的作家被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夺去了宝贵的生命,过早地告别了自己钟爱的文学。在这前后发生的多次严酷政治争斗和运动中,也有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遭遇了同样的命运。30年代著名的“左联五烈士”,就是自然生命和文学生命都被外在政治力量彻底戕害的代表。60年代,老舍、赵树理等作家,也被特殊的政治环境终结了生命。曾经创作过《边城》《长河》等优秀作品的沈从文,从1950年至1988年,生命中近40年的时间,基本上与文学绝缘,被迫改而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20多岁就创作出《财主底儿女们》和《饥饿的郭素娥》的路翎,从32岁起,整个创作生命就被终止,最后成为了一个半痴呆老人。他在劫难后创作的作品质量就如同小学生作文;还有著名的“九叶诗派”,“七月诗派”的诗人,同样几十年被迫与文学割舍……

外在的压力不但能终结人的创作生涯,而且还会深入人的心灵深处,扭曲和异化着人的精神世界。在20世纪作家中,就有不少作家是迫

于政治的影响,在躲避、恐惧或有意献媚的复杂心态下,主动地扭曲或放弃自己的文学事业,放弃了独立的艺术精神。这些作家文学生命力的萎缩,与他们自我精神世界的缺陷相关联。

我们可以列举郭沫若、茅盾、曹禺、艾青这些现代文学的风云人物来作为佐证。中国现代诗歌的开创者、曾经创作出气势磅礴而富有想像力的《女神》的郭沫若,在晚年写出来的却是“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这样的打油“诗句”;曾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先河的茅盾,建国后几乎没有文学作品问世;23岁就创作出《雷雨》,从而奠定了中国话剧基础的天才剧作家曹禺,建国时才刚刚40岁,但这之后他所创作的为数有限的几部剧作,却不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位置。一个优秀的剧作家似乎突然沉寂了。还有艾青,40年代的诗歌巨擘,以一句“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抒发着全民族悲哀的艾青,在50年代写出的诗句却是“杨家有个杨大妈,她的年纪五十八,身材长得很高大,浓眉大眼阔嘴巴”。这些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才华的作家,应该承担起中国新文学的希望,却在有着一帆风顺仕途的同时,显示了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的创作生命。

应该说,作家们中断或萎缩自己的创作生命,并不完全都是自愿的,更多的情况与他们所遭受到的外部政治压力有关。所以,在上述许多作家的日常生活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内心的创作愿望与现实环境不和谐的现象。茅盾身居政府要职,却在躲躲藏藏中偷偷创作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一边撕毁一边还在继续创作;曹禺的晚年,也一直在痛悔中度过,虽然他不能再像年轻时一样为我们留下《雷雨》那样的杰作,但他发自心灵深处的真诚忏悔却足以成为我们非常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这是文学的坚韧力量与孱弱个体生命对于强大政治势力的艰难抗争,是文学对于现实利益和环境的超越。

20世纪文学上的这些悲剧,不仅是身在其中的作家们的悲剧,也不

仅是这一世纪文学的悲剧。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意义。对于这些悲剧中所包含的政治内涵上的反思,已经有众多知识分子正在进行着,对于作家们心灵世界的拷问,许多有识之士也已经有了充分的重视。

在 20 世纪众多作家们的悲剧中,诗人兼散文家何其芳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意义。这并不是说在这些作家中,何其芳的文学成就最高,最富有创作才华,而是他文学生命的中断历程颇为独特,其中所蕴涵的曲折、坎坷和疑问特别值得我们思索。

首先,何其芳的人生和文学经历了比一般人更大的转变。在抗战之前,何其芳一直以一个纯文学作家而知名。他早年创作的、后来收录在《预言》中的诗歌和《画梦录》中的散文,完全是唯美文学的典范之作。他留给人们的形象,也是一个感伤浪漫的瘦弱诗人,一个整天沉迷在梦幻中的文学青年。然而,在短短的几年之后,他却成为了一个具有浓郁政治色彩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活动家。到后来,他更基本上放弃了文学创作,成为了一个行政干部,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何其芳形象转变的幅度之大,在 20 世纪中国作家中是很突出,也是很少见的。

其次,何其芳在文学成就上的变化也非常明显。何其芳曾经是后期京派的新秀,既创作过文笔清丽、结构精巧的《画梦录》,又书写下袒露内心深处困惑与彷徨的《预言》和《夜歌》,其清丽与真诚,曾经感染了不止一代青年人,甚至被看作是京派作家未来的希望。但在 40 年代延安整风运动后,何其芳就很少再有优秀的文学作品问世,“文革”劫难后所创作的诗歌更完全失去了诗歌韵味,与《预言》、《夜歌》时代相比,判若两人。而且,不只是创作,他整个的文学观念、文学品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乎成了政治文学自觉的认同者。这期间的差别之巨大,很容易使我们想到五六十年代劫难前后的路翎。但事实上,何其芳的生活环境与路翎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路翎在劫难时代经历的是十余年的牢狱之灾,

是残酷的生活和政治压迫,而何其芳的生活道路却基本上顺利通达。何其芳文学创作的退步教训更值得人们总结。

还有一点,何其芳也很具代表意义,那就是他在放弃文学追求时内心世界的困惑和痛苦。何其芳在漫长的改变自己身份的过程当中,内心世界之复杂和痛苦是非常深刻的。后来,他尽管走上了行政管理者的道路,但在许多场合,他反复表达着自己对于放弃文学创作事业的巨大遗憾,并想方设法予以弥补。甚至在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在计划写作长达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并抱着重病,坚持远赴外地体验生活。文学不可压制的坚忍力量,文学不肯泯灭的精魂,在何其芳的身上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何其芳这些“改造”与“反改造”的内心苦痛,在他的生活和创作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像他在延安时期和建国后创作的《夜歌》和《回答》,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理改造痛苦的真实写照,具有特别的文学意义和文化意义。但是,由于何其芳性格比较内向,建国后又基本上停止了记日记的习惯,后期的创作也多是应景之作,他在转变过程中内心的许多衷曲无人知晓,只有期待我们的思考和探寻。

纵观何其芳的一生,他的形象身份不是清晰完整,而是暧昧支离的。24岁的《画梦录》诗人、作家,32岁的共产党文化“钦差”,45岁的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和《红楼梦》研究者,54岁的“牛鬼蛇神”,65岁开始写作一生惟一的长篇小说……何其芳的生活轨迹,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他们不能把握自己的生活道路,也失去了设计自己人生目标的可能性。在政治的推动和胁迫下,他们如同一叶飘萍,游移在不同的身份价值上,不能进行自己的控制与把握。可以说,“我是谁”的困惑曾深深地困惑着何其芳,也折射着整个20世纪中国作家命运的深沉悲剧性。

逝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何其芳所留下的疑问确实值得我们后人

去思索、去追问。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角色转变？为什么会舍弃文学道路走上政治道路？又为什么在放弃文学创作时会有那么强烈的心灵痛苦？既然如此痛苦他又为什么还要放弃？他的文学水准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下降和退步？他的困惑是真诚还是虚伪？到底有没有自己的价值？早在延安时期，这些问题就引起过很多人的关注和争论。50年代初，何其芳在编选自己的散文选集时也曾产生过这样的困惑。何其芳去世十周年后的1987年，又有学者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并称何其芳这种思想进步而文学水平退步的现象为“何其芳现象”，引发了一场大的争论，许多学者都参与过探讨。但应该说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找到这一问题的令人完全信服的答案。

本书就试着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以为，解决这一问题惟一的方法，是深入何其芳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循着他的生活道路、思想轨迹和深层性格心理，去寻找何其芳的内在精神机制；通过联系外在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去发掘何其芳道路变化发生的深层原因。我们相信，在距离何其芳的生活年代已经有了大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许多历史的真相已经得到披露，许多思想的障碍已经被扫除，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是完全可能的，反过来，这一思考也能更促使我们对社会历史思考的进一步深入。

我们以为，何其芳悲剧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个人的性格，而这又与何其芳的生活经历和教育环境有直接关系。何其芳的性格从根本上来讲是软弱的。虽然他有时候很固执很倔强，但内心世界却缺乏反抗性。小时候的生活经历，如土匪的围困、寄人篱下的生活以及亲人死亡等经历，尤其是父亲对他个性的强烈压抑，使他长期生活在孤僻之中，也培养了他脆弱、软弱的个性特点。这样，在何其芳的内心世界与现实环境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他一方面渴望着新的环境、新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却缺乏足够的反抗现实的勇气。性格的软弱，使他很易于去

依赖一种强力,去躲避、畏惧乃至迎合,却不是批判、反抗现实。

何其芳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验相当单一也是导致他精神悲剧的重要因素。由于童年时代个性的压抑和生活环境的囿限,何其芳过早地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文学内。他所获得的思想资源,基本上只局限于文学这一领域,他所惟一擅长,甚至可以说是惟一能够做的,只是文学这个幻梦。他没有广阔复杂的思想,没有独立成熟的性格,缺乏对社会和人生丰富深刻的认识,也没有丰富的社会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他是纯洁的,但又是单纯的;他真诚,但有时候难免显得幼稚。如果在正常的岁月,何其芳的文学梦完全可能顺利地实现,甚至可能造就出一个纯文学的大师,但不幸的是,何其芳生活的岁月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季节,飘摇的时代风雨注定他的文学梦不可能长久地持续。这样,当何其芳的文学之梦最终不可避免地遇到冷峻的社会现实的时候,他只能彷徨,只能犹豫,只能最终屈服,而不可能真正深刻地认识现实,形成真正坚决而果敢的反抗能力。可以说,从根本上而言,何其芳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他的悲剧是一个诗人的悲剧。

当然,何其芳的悲剧不完全是他个人性格和思想的原因,时代也担负了一定责任。我们绝对不可忽略他的悲剧在20世纪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说,何其芳的文化和精神缺陷,不只是属于他个人,20世纪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且,这也是在这一世纪中那么多知识分子缺乏个性,那么容易屈从于政治压力的重要原因。何其芳的人生道路,不只是他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是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严峻要求,他不过比别人走得更远,转变的幅度更大而已。他在延安时期的转变,和同时期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如出一辙,如丁玲、周立波、艾青等,都经历了与何其芳几乎同样的心路和生活历程。“何其芳现象”所体现的事实上也是许多共和国作家的共像。与何其芳同时代的几乎所有的作家和诗人:郭沫若、艾青、冯至、臧克家、卞之琳、曹禺、巴金、

老舍、丁玲……在“思想进步”的同时，创作水准都无一例外地下降。这是一个特殊时代中作家们不可逃避的历史宿命。

需要指出的是，在审视何其芳的人生和文学道路时，我们并不认为他从书斋走向社会，从“纯美”走向现实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从审美风格上，我们都认为这是何其芳个人对两种难分轩輊的道路的自由选择。正如《画梦录》与《夜歌》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学史价值，何其芳走向延安的人生经历也并不比他在北京读书时更缺少意义。在民族危亡时代，做战士还是做诗人的选择，必须结合具体环境进行评判，不能简单地予以臧否。

我们所否定的是何其芳文学心灵在政治影响下的屈从和扭曲，是政治对文学的侵袭与掠夺。我们认为，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何其芳，最大的遗憾就是文学心灵的扭曲和退化，是他在为政治服务信念下进行的政治化批评活动。而他最大的价值，也存在于那颗未曾彻底泯灭的文学心灵艰难的自我维护与抗争。这一抗争的最终失败，在于政治对他的全方位异化——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许多年的政治影响之后，何其芳从肉体到心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缓慢的、轻柔的，却又是彻底的，是最为残酷的。它体现着时间的力量，寓含着人性和生命的脆弱，更清晰地折射出政治无所不在的巨大威力——在这一威力面前，个人的抵抗确实是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我们看到何其芳的变化，除了沉重而悲凉的压抑，还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何其芳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已越来越远，在越来越远的将来，我们也将逐步淡忘他的现实生活，只记住一个《画梦录》时期的何其芳，一个纯美的何其芳。但是，作为一个曾经活生生地生活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作为一个度过了20世纪大半个世纪的作家，他的形象要远比他所留在文学史上的形象复杂。我们不能以文学史的标准去苛求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但我们相信，通过对何其芳这个文学经历和生活经历都非常复杂的